

北洋法政学子的激情反击

——李大钊等人对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议”述评

李继华

(滨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对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基本倾向是鼓动日本参与分割乃至独占中国,这是不能否认的。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满怀爱国激情,将该书译为中文并加“驳议”。这些“驳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1)殖民野心,理当痛斥;揭其实质,应属犀利。(2)愚忠本性,自应讽刺;拥袁甚力,亦属忠君。(3)共和政体,热切维护;民主人权,亦有述及。(4)良药苦口,多有借鉴;爱国情激,间出恶言。(5)全力拥袁,局限显见;仓促编就,差误难免。(6)“驳议”前多后少,缘由值得探讨。对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和李大钊等人的“驳议”进行深入研究 and 客观评价,是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民国初年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关键词:李大钊;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01

The Strong Counter-attack of the Students from Beiy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The Refutation of Nakajima's *The Fated Division of Shina* by Li Dazhao and Other Students

LI Ji-hua

(School of Marxism,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0, China)

Abstract: Nakajima's *The Fated Division of Shina* reflects the Japanese opinion on the invasion of China,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o encourage Jap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vision and even the exclusive occupation of China. Li Dazhao and some other students from Beiy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the boom into Chinese and then refuted it with great passion. The basic refuta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colonial ambition, which should be exposed and condemned, (2) foolish loyalty, eg. the faithfulness to Yuan Shikai, which should be ridiculed. (3) the republic governmen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hich should be safeguarded, (4) borrowed per-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16)

作者简介:李继华(1958—),男,山东滨州人,教授,主要从事李大钊著作与生平研究。

suasion and patriotism intertwined with the evil words. (5) the obvious fallacy of full support of Yuan Shikai, and errors due to hastily compilation, (6) more refuta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book than of the second, which is worth exploring. A thorough study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Nakajima's *The Fated Division of Shina* and Li Dazhao's refut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epen the study of Li Dazhao,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Li Dazhao; Nakajima; *The Fated Division of Shina*; refutation

一、从《支那分割之运命》到《〈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1912年10月15日,日本政教社出版了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日文本(完稿于1912年4月之前),到12月底又出版了该书的中文本(小谷保太郎发行,1913年1月10日再版)。

中岛端(1859—1930),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之一,著译甚多。他自幼接受旧式教育,六岁开始读《论语》,十三四岁开始用汉语作文、写诗,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1902年春到1908年10月,他曾在中国的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任职、游历。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员。日俄战争爆发时,翻译法国人波留著《俄罗斯》共三篇,同时编印《日俄战纪》(画集),前后共出30册。1904年11月到1907年10月,曾被设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聘为翻译。1908年10月末到北京,亲历了光绪、慈禧病逝和出殡及国会请愿运动等重大事件。

1911年春末回日本。辛亥革命后开始撰写此书,历时一个半月完稿。起初以《支那的将来与日本》为题,后改名《支那分割之运命》。从其基本倾向来看,该书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可以视为日本侵华思潮“涡中之一浮沤”。对其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基本倾向是鼓动日本分割乃至独占中国,还是不能否认的。

该书日文版出版后,迅即激起在日华人

的愤怒,他们买了几十册分寄中国各方面。主要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设在天津)学生组成的北洋法政学会得到此书后,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立即组织翻译,并予以驳斥。驳议的主要形式是“译者曰”(即按语)、眉批和少量的夹注,共计按语58段,眉批183处,夹注5处^{[1]431}。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之一(另一编辑部长是郁嶷,列第一位),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和出版、发行事宜,同时也是主要翻译和撰稿人员。该书定名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北洋法政学会编译、发行,天津华新印刷局印,1912年12月“初一日首版”,“十五日发行”)。北洋本迅速引起关注,发行较为顺利,到1913年4月即再版,1915年又再版。1962年,上海图书馆又“悉照原书版式,重予排印”。

另外在1913年,上海的群益书局还出版了田雄飞所译《支那瓜分之命运》^[2-3]。在南京图书馆的网页上,可以检索到以下内容:“支那瓜分之命运,专著,出版发行:上海群益书社,190页,32开;馆藏号:MS/D731.309/4”。就此来看,这应该是田译本的全本。2015年10月29日,笔者到南京图书馆查询,被告知该书破损严重,无法查阅,只好抱憾而归。

在此之前,笔者检索到湖南图书馆藏有田译本,即于2015年7月下旬赴长沙查阅。笔者在该馆看到的田译本,既无目录,也无版权页和定价,只翻译了中岛端原书的上篇第

4章(“共和政体之将来”)到第10章(“支那之运命”)和下篇的前两章(“东亚之们罗主义”和“支那之瓜分与日本”)。这只能算是一个节译本,与上海群益书局所出版的田译本,在相关文字上是否同一,尚难断定。

自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成果很多,成为近代人物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对《〈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的研究也取得了某些成果。刘民山的《李大钊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对该书既作了较为具体的述评,也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研究资料。1999年的《李大钊全集》首次将该书全文收录(黄霞、唱春莲、赵洁敏点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点校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2005—2006年,日本学者後藤延子的长文《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泛论——一个亚细亚主义者的选择》(4万余字,分载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科论集〈人间情报学科编〉》第39号、第40号),对中岛端其人其书和北洋法政学子们的“驳议”,既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客观评价,也有值得斟酌之处(主要是关于中岛端对华基本倾向的评述)。其他一些关于李大钊的论著,对该书也多有提及。

但是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的研究还相当少,甚至对该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思潮、报刊、事件等也不甚了了,对该书中一些由于翻译和排印造成的差误缺少鉴别。中国大陆的有关著作,对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往往简单地予以否定,甚至斥之为“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百般污蔑”,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则甚少正视。对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的“驳议”,则简单地全盘肯定,缺少深入的分析、探讨,对其中的一些人身攻击之词也避而不谈。这既不利于今天的人们阅读和领会这部著作,也是全面、深入开展李大钊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特别是

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种缺憾。

今后的中国近代史和李大钊研究,将更加向学术性、专题化和考据性的方向发展。对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和李大钊等人的“驳议”进行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将是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深化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民国初年历史研究的切入点之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对《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议”进行述评。

二、李大钊等人对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议”

总体来看,李大钊等人的“驳议”,应属青年学子们的激情之作,既表明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和较高学识,也难免显现出某些缺陷。

(一)殖民野心,理当痛斥;揭其本质,应属犀利

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在全盘否定袁世凯、孙中山等民国人物,历数中国无实行共和之资格、历史、思想、素养和信念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必然被分割的结论,极力论述日本应参与对华分割,甚至应独占中国,并为之制定“方略”,暴露了对中国的侵略本性。

由于中岛端的最终结论(日本进一步分割独占中国,还是退出中国)有些模糊,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迷惑性,时至今日仍然令人难以解读,在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倒是旗帜鲜明,对中岛端关于中国的殖民野心和分割乃至独占图谋予以痛击,明确指出日本“举国上下,时有并吞中国之雄怀”,“孟罗主义者,即日本独吞中国之代名词耳”^{[1]464,438}。

在“绪论”的“译者又曰”中,北洋法政学子们指出:“是书开宗明义,即首诋其朝野上下,当中国多事之秋,尚徬徨于醉生梦死之中,不能明断果决,急起而分割中国。嗟乎,中日素称同种同文,何此不祥之言,竟出自友

邦人士之口也。”^{[1]271}

“支那之运命”一章的第二则“译者曰”(共四则)中指出:“日本与我国同洲同种,地邻密迹。唐宋以来,历史上已有密切之关系。尤宜顾唇齿之义,提携辅助,匡我不逮;则我之益,亦非日之不利。诿可幸灾乐祸,张皇其辞,取言论一时快意,不顾挑动两国人民之恶感耶?虽然,吾国人思之,蒙古、西藏,固我国之领土,其得其失,于日人何与?而著者乃言之若是迫切,一若将旦夕不保者,何故?彼岂有爱于我,而促我深省耶?毋亦警告其政府,谓蒙古、西藏已将入他人手,则其国势力所可及之区域,亦当急起直追,勿落他人后耳。”^{[1]405}

在“日本与支那分割之利害”中,针对中岛端所说“使我果有绝大之果断,绝大之力量,绝大之精神抱负,进而挽回支那民族之厄运,救四万万生灵于水火涂炭之中。更进而言之,王道荡荡,我大和民族之天职,将于斯时发轫矣”^{[1]478}。李大钊等人指出:“寥寥数语,莽莽风云,还是欲独吞中国耳!”“近顷日人所盛倡者曰亚洲孟罗主义也,曰大亚细亚主义也。听其言则友朋也,窥其心则盗贼也。所谓此等主义者乃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词耳!”^{[1]478-479}

在“日本之外交”中,针对中岛端所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东三省之土地人民不举而奉诸日本”,“复还于中国”,是有恩于中国,并抱怨中国人不感恩日本,北洋法政学子们指出:“著者以狂癫之论,助长其政府贪鄙之心。俄日战后协约,以为未劫夺中国特别权利,非常悔恨。”“不取东三省,非日本之所不欲,乃各国之所不许耳,于中国何恩之有?”^{[1]498,509,498}

全书的最后一则“译者曰”中指出:“著者意在分割中国,斯不得不诬中国之可以分割。欲诬中国可以分割,斯不得不造作蜚语,散布流言,以淆乱天下之耳目而因以售其奸。是书下篇推论分割中国,故于上篇虚搆一中国

可以分割之影象。于是无而为有,虚而为实,细而为钜,捕风捉影,信口雌黄,绘声绘形,惟肖惟妙。岛人心事如是而已。”^{[1]548}这则“译者曰”可看作对全书的总结。认为中岛端论述中国的分割是污蔑、“虚构”、无而为有、信口雌黄,或许过分一些。与“支那之运命”一章的第二则“译者曰”(共四则)中所说“右(上)所述数端,皆属事实。吾政府当局,吾爱国同胞,所当反观深省,合谋挽救者也”^{[1]404}也不尽一致。但是中岛端夸大和渲染了中国的必然被分割,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在北洋学子们的有关论述中,虽有某些不尽妥当之处和人身攻击之词,总的来说还是态度鲜明、言辞犀利的。

(二)愚忠本性,自应讽刺;拥袁甚力,亦属忠君

中岛端在《支那分割之运命》中暴露出浓厚的忠君思想,对中国和日本的君主制情有独钟。基于此立场,他认为清朝的灭亡是“亡国”,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好感,对民主共和的命运不抱乐观态度,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与此相应,他对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君主立宪政体赞不绝口,多次提及“不世出之明君”“英主”“圣天子”“圣德日新,如日月之中天”等。

对中岛端的忠君思想,北洋法政学子们多有抨击和讽刺。

针对中岛端在“袁世凯之月旦”中所说袁世凯“因取得太后私财,又屡假太后旨,搜括王公蓄积,前后计数百万,足支三四月之需”,李大钊等人评议道:“爱亲党罗氏之私积,皆三百年来吾侪小民之汗血脂膏也。不取之,则以养独夫之爪牙,饵吾民之豺狼。袁氏此举,功德无量。著者必欲颠倒黑白,适见其奴性之深也。”^{[1]278}

针对中岛端在“孙逸仙之月旦”中所说“且男子参政之权,尚未全实现,岂可骤容心胆丧失之妇女,狂叫怒号乎”?北洋法政学子

们辩驳到：“妇人参政，美洲有行之者。英、葡诸国，且得以女子为元首。即日本皇室典范，太后及女亦均可摄政，未闻有议之者。同一事也，何在彼则有行政之能力，在我则不应有参政之权利乎？彼狂叫怒号之妇女，正其爱国热诚之所致。著者以专制奴性之眼光，讥汕上国，亦可鄙矣。”^{[1]291}

在“共和政体之将来”一章最后的“译者曰”中，李大钊等人指出：“日本为君主国，天皇之权极大，其宪法中有‘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之规定，故其奴隶根性，尚未尽除。”^{[1]315}

在“日本与支那分割”一章中，针对中岛端对中国人“无爱国心，无忠君心”的批评，北洋法政学子们在眉批中写道：“共和国民之精神，以忠国为荣。岛人奴性最深，死报忠君二字，竟无觉醒之一日。可怜！”^{[1]443}

在“日本百年后之运命”的“译者曰”中，李大钊等人写道：“每代之世袭君主，皆称为〈为〉圣明之天子，不世出之圣主，岂非至卑鄙不可对人之欺世语哉？”^{[1]485}

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条眉批批评中岛端“口口王道，犹是天宝时代之头脑”^{[1]547}。

客观地说，北洋法政学子们对袁世凯的全力尊崇和维护，亦有崇拜伟人、忠诚君主之欠缺，亦属对袁世凯专制本质的认识不清。

（三）共和政体，热切维护；民主人权，亦有述及

在《支那分割之运命》中，中岛端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对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袁世凯、孙中山等，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态度，多方讽刺、贬斥。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们，则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满怀期待，对孙中山、袁世凯等民国人物热切维护。全力拥袁固然有局限，维护共和与民族尊严则衷心可鉴。

在“孙逸仙之月旦”中，针对中岛端对孙中山和中华民国的讽刺挖苦，北洋法政学子们热切地赞扬说：“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离海表，辛

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蠹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此岂书生弄舌鼓唇所能解者哉？……中华民国，乃真民国，乃真共和国。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有袁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也。”^{[1]293}“中山退隐，高洁之怀，天下共见。乃挑拨之不足，又从而诬之。吾无如尔何，吾惟有以人头畜鸣目之而已。”^{[1]292}

在“支那人无共和之信念”一章的第5则“译者曰”（共7则）中，李大钊等人指出：“民国光复，举国一致，实具有力者致其力，有财者致其财之概。以血液注于祖国之健儿，蓬勃云涌，以视法国固未遑多让也。著者乃举一二毛屑细故，武断我国无共和之信念，此其理论，宁复可通？”^{[1]345}

“支那人有省份观念，无国家观念”一章的最后一则“译者曰”写道：“去年国民军起义，全国云涌，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劳心者劳心，劳力者劳力，奔走呼号，废食忘寝，卒驱除国家之魔障。此而谓之无国家观念，其梦呓耶？抑别具肺肠耶？”^{[1]400}

在“日本与支那分割”一章的眉批中描述道：“三五年来，革命怒潮东西震荡，君主一物将绝迹于世界。西风红叶，树树惊秋，大限来时，悉无幸免。此满清政府之所以倒，爱亲党罗氏之所以衰也。且我中华建国，合五族为一家，礼制大同，政权平等。”“澎澎勃勃之新中国，亦将跃起腾飞。”^{[1]449,464}

与维护共和政体、反击中岛端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曲解相对应，李大钊等人对民主共和、自由人权等，亦有述及。

在“支那人无共和国民之资格 无共和之历史 无共和之思想”一章的第一则“译者曰”

中,北洋法政学子们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共和之形式,而有共和之精神。”“中国自由民权之精神,所以长存而不没也。”^{[1]319-320}

在“日本百年后之运命”的“译者曰”中,李大钊等人写道:“日本阶级之习,由来已久,中人甚深,牢不可破。名为立宪,其实君主之权无限。名为平等,其实华族之贵,决不肯下倨于齐民。民权主义大昌以后,所谓允文允武神圣不可侵犯之君主,奕祀相传,拥护皇室之华族,将在淘汰之列。”^{[1]484-485}在一则眉批中,针对中岛端所痛心和惋惜的日本君民“于不知不识之间,情谊日薄,渐归冷淡”,李大钊等人又指出:“此乃日本国民自由平权思想发达之所致也。”^{[1]484}

在下篇最后一章的“译者曰”中,北洋法政学子们指出:“吾国共和告成以来,日本君党妒极嫉深,无所不用其阻挠。盖忧其国人受吾民国之影响,不肯受皇帝贵族之愚弄奴隶,将有溃堤决防之虞也。故汲汲与俄协谋,极力破坏,欲使东亚大陆永无民主国发生,以保全其皇室万世帝王臣妾全国之业。而彼等亦得世袭罔替同享最上之权利。不知此为世运所不容,人道所不许也。夫二十世纪者,平民政治发展之时期也。二十世纪之人民,应享平等自由之人民也。不见夫三四年来之大势乎?葡国革命,吾华革命,俄罗斯亦蠢蠢欲动。吾恐帝王君主之魔物,不数十年将绝迹于世界矣。”^{[1]547-548}“余方谓著者以先觉自命,奔走呼号于国人者,必国利民福之问题,曰平等也,曰自由也,曰推倒君主也。抑知其不然。乃欲残民以逞,扰乱和平,而梗大化。吁,曷其谬哉!”^{[1]548}

总起来看,中岛端是以“总统公选”“国民之公选”“万事以人民为主”“主权在民”^{[1]317}等西方民主思想,来强调中国民主自由传统的局限性,从而否定之;李大钊等人则把民贵君轻、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等民本思想视为中国的民主传统。双方各强调了中国民主自由

传统的局限性与合理性,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视角和相互碰撞。“总统公选”与“国民之公选”,在理论上当然高于“爱民如子”和“为民做主”等民本思想,实际上则不但在专制主义传统较为深远的中国很难做到,即使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也难以完全做到。孟子等人的民本思想,固然达不到主权在民的高度,但对中国历史上盛行的君主专制的“君本论”也是一种制约,不能完全否定。中岛端极力推崇的日本天皇制,其实也是君主立宪体制下的有限度的“君本”思想,亦即民本思想。这样,中岛端以比较模糊、虚幻的民主自由理论来贬低、甚至否定中国的民主传统,进而否定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资格,的确论据不足。李大钊等人大力宣扬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民主传统,努力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却未讲清如何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向现代共和制度转变的路径。

有论者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将孟子的王道主义理解为民本论,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对于民本论的理解却不无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民本论就是主张国家的政治主权在人民而不在国君,甚至可以说民本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十分接近。这种看法起源很早,也很流行。谭煊吾在《孟子的民主思想》中说“孟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保姆,也是世界先知先觉者的革命导师”。上述各种说法,都认为民本论就是以民众为政治主体,可简称为“民为政治主体论”。实际上,“民为政治主体论”是不能成立的。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概念,按其本义是指多数人的统治,即通常所说的主权在民。到了近现代,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也进入中国,人们方才了解到什么是民主。身受坚船利炮欺侮的中国学人不甘心自己的落后,在努力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也积极从古人那里挖掘思想资源,将古老的民本传统说

成是与西方民主近似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代替现实,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中并没有民主的传统。把古老的民本传统看作是与西方民主近似的东西,是主张民为政治主体,这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民本论的关键是强调民心,它是一种特殊的君本论,确切一点说,是一种“理想化的君本论”。民本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民心论”,是在君本论基础上,重视民心的作用,强调成败得失由民心向背来决定的一种政治学说。虽然这种政治学说的基础仍然是君主制,因为它比较重视民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对君主专制制度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不受限制的君主专制政治相比,这种政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因为如此,后世对现实政治进行调整的时候,无不以孟子为精神资源。因为民本论的基础仍然是君本论,这个大限并没有突破,所以它在专制政体中才得以生存,而没有被禁绝;又因为民本论是“理想化的君本论”,与现实君本论有一段距离,形成了一定的张力,所以才能够成为一种“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相抗衡,成为两千年来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中国两千年政治发展史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治理得比较好的时期;凡是“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比较小或完全没有张力的时候,一定是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的时期。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至于其他方面,比如土地兼并等等,都可以视为这个基本规律的外在表现,可以将其纳入次一级的规律。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为“理想政治”提供蓝图的,正是孟子的王道主义。由此说来,孟子王道主义“理想化的君本论”所建构起来的“理想政治”,功劳不可不谓大矣^[4]。

有的论者还专门探究了李大钊的民本思想,指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一直被儒家学派奉为治国安邦、德化君臣、约束君权的指导思想。李大钊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环境,对他早期的民本思想有直接影响。他强调“国家本位”,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道德至上”“民意至上”的所谓“民本主义”民众观,重视民意和民众力量的发挥,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反对专制,提出执政应以民为本,执政者应关心民生、保障百姓生活^[5]。

这些,有助于理解李大钊等人在“驳议”中对中岛端全盘否定中国民主传统的荒谬之处。

(四)良药苦口,多有借鉴;爱国情激,间出恶言

针对中岛端极力渲染中国被分割与民主共和无前途,北洋法政学子们既予以斥责,也多次提醒中国人引以为戒。有些时候,则忍不住口出恶言,报以人身攻击。诸如:

著者乃以察满清朽败官吏之思想,察我民国新人物;窥专制国家之眼光,窥我共和政府。谰语诡词,厚诬为里面分割确证,何荒诞僻谬,一至于此。虽然,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我政府诸公僥视为药石,深自警省,未始非他山之一助云^{[1]413-414}。

著者之弟,幼稚也,易欺也,试问,人人得用其男风乎?著者之妹,柔弱也,易欺也,试问,人人得用其野合乎?如曰:然也,予欲无言。如曰:不然,则所以不然者,其有以语我来。呜呼!吾不欲弄此闲笔墨,愿世间有心人其勿忘此獠^{[1]410}!

尔与尔妻,其为有实力之掠婚乎?抑为一纸空文之婚约乎?岂非靠不住者乎?然则尔何不喊尔父兄,日夜瞰其卧室,而防其有所私乎^{[1]408}?

世人皆人也,非虎狼也。其人面兽心者,中岛端耳^{[1]408}。

尔非新政府之裨内虫,何以知其长短^{[1]412}?

尔非蠢龟,何以知未来事,着实混帐^{[1]412}!

需要说明的是,上引这些人身攻击之语,多出于“支那之运命”一章的眉批和“译者曰”中。这与此章驳议者的个人性格和修养有关,也反映了全书“驳议”的容忍度。

值得提及的是,1912年已经50多岁的中岛端,在其书中也难免用有人身攻击之词。在“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机”一章中,他提及:“幸德一辈,何物鬼畜。以日本民族一分子,敢谋大逆不道之事。其本身之悖乱,直不可以人类视。”^{[1]533}其中“鬼畜”“直不可以人类视”等语,即属人身攻击之词。

(五)全力拥袁,局限显见;仓促编就,差误难免

如果说中岛端《支那分割之运命》的最大亮点是抨击袁世凯,揭露其投机本性和专断积习,预测他会走向帝制复辟,那么李大钊等北洋法政学子在“驳议”中表现出的最大缺陷就是全力拥护袁世凯,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辩护。尽管李大钊等人的拥袁由许多因素造成,也有可以理解之处,但在当时国内外疑袁、反袁声浪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全力拥袁毕竟有不可回避的局限。

另外,由于翻译中岛端著书并加驳议的时间短促,《〈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的差误自然难免。除了语句的翻译、断句、排印和校对有许多问题外,所加的眉批和“译者曰”,尽管有些较为有力,表现出较高的理论素养,但有些则属简单反诘,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

(六)“驳议”前多后少,缘由值得探讨

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全书22章,译者共加“按语”58段,眉批183处,夹注5处。其中上篇10章(含“绪论”),有“译者曰”和译者注39段,眉批108处,下篇12章,仅有“译者曰”19段,眉批75段、夹注5段。总

的来看,显呈前多后少的趋势。

下篇大致以前五章和后七章(第六章“日本之教育”开始)分为两个部分。前五章有“译者曰”9段,眉批53段、夹注5段。后七章只有“译者曰”10段,眉批22段。大体上也是前多后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开端激情澎湃,结尾难免才思困乏的一般规律外,还因为中岛端著书的上篇主要讲中国的分割问题,下篇(特别是后七章)主要是对日本的反思。两者都讲得比较尖锐、尖刻。对前者,李大钊等人自然驳议甚多,对后者则既不能否定,又不好肯定,似乎不能很好地应对。

总起来看,民国初年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从其原著者和驳议者的基本倾向来看,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和“北洋法政学子的激情反击”。李大钊等人的“驳议”,作为青年学子们的激情之作,则既表明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和较高的学识,也难免显现出某些缺陷。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 点校本. 黄霞, 唱春莲, 赵洁敏, 点校.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 于蕾, 罗智华. 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一 史部[M]. 北京:线装书局, 2007:575.
- [3] 张晓.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25.
- [4] 杨泽波. 孟子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84-185, 190-191, 193-194, 421.
- [5] 刘建华. 李大钊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5(3): 69-71.

(责任编辑:白丽娟)